

让人们看到真实的长征

——范长江对红军长征的报道

□ 王晓霞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成都出发，经绵阳、江油、平武等地，于9月2日抵达兰州。9月4日，他开始动笔撰写红军长征的通讯，依托沿途实地走访与一手见闻还原长征真实历程，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军进行虚假宣传与污名化的舆论垄断，让红军长征进入国内外公众视野。范长江因此被誉为“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

想了解一些关于红军的真相

九一八事变之后，范长江对东北“无声无息地送掉了”深感痛心，意识到“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抗日问题”，要在“实际斗争中找出路”。他曾作为一名志愿者，赴热河、长城沿线前线劳军，又搭乘军车去绥远开展为期十天的社会考察。随着东北和华北危机的加深，西北的战略位置凸显，促使他将目光聚焦西部。西部能否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范长江毅然决定深入西部实地考察，去探寻民族抗战的破局之路。

想了解一些关于红军的真相，是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的内在思想动因。1933年华北局势危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置抗日大局于不顾，调集重兵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在范长江看来，这是“国力的巨大消耗”。彼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更不“认得一个共产党人”，仅从报刊或者马路的标语、口号中获取只言片语。国共双方孰真孰假，是非曲直，更是让他无从辨别。为了弄明白“这样大规模的內战，是为了什么”，范长江于1934年夏在南昌多渠道搜集“大批红军方面的油印土纸小册”，如饥似渴地阅读，得出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战争丝毫“没有道德的基础”的判断，并从中国共产党“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得到

了兴奋与愉快”。南昌之行促成范长江思想发生转变，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对共产党过去的了解根本不对头”，反对“国民党要坚决消灭共产党的立场”，故而对红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正如范长江所说，“我想去研究红军北上抗日的问题，最好到红军中去，彻底弄个明白”，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进入红军，那我关心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

客观报道红军长征，还原红军真实面貌

从1935年7月到1936年5月，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数千公里。其间，他近距离观察和研判红军长征行军态势，先后在《大公报》发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松潘战争之前后》等系列报道，生动展现红军长征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范长江最早对中央红军长征的全过程进行了报道。在《从瑞金到陕北——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一文中，他以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亲身经历为写作视角，叙述从瑞金到陕北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报道中既有心态的描述，更有场景细节的纪实。亲历者回忆翻越夹金山的极端艰险：“山上积雪几尺厚，空气也不够，到山顶即人人头昏，滑倒地上，立即死去。过这架山，死去好些人。”亲历者还讲述了过草地的心惊胆战：“在草地里一望平原，无树无村，人影也不见一个，地下间隙的长着一堆一堆的丛草，地皮是水和泥混成的软土，不能支持人的体重，下脚就陷入一二尺深，走上半里路，已经使人感到万分疲乏”，“到了夜间，风雨交加，下面潮湿又透草而过，全身战栗，冷彻心肝！”字里行间体现着长征之艰难，彰显了红军不畏艰难险

阻的顽强革命意志。

范长江始终秉承真实客观的新闻立场，坚持“忠实地报道给读者”，反对“国民党要坚决消灭共产党的立场”，提出国共两党要有平等地位，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的基本观点。他在公开报道中直接使用“红军”的称谓，提及“剿匪”时加注引号以表明自己的立场。针对国民党污蔑红军无政治目标的错误说法，范长江坚称红军是“北上抗日”。这些报道，让国内外对红军长征尤其是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有了理性认识。

范长江的长征系列报道，向外界真实展现了红军的严明纪律与优良作风。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中，他详细记述了红二十五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凡所过之地，秋毫不犯，所取用任何物资，一律给以现金，只有比市价多，没有比市价少的”，即使遇到农民已经逃离的，“如果取用了什么东西，总是付加倍的代价，放在农民家里，绝对的‘不占便宜’”。这些鲜活的事例与朴素的语言，展现出红军爱民亲民、严守纪律的本色。

在《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一文中，范长江直接点明红军的组织特征，“就红军的特殊性言之，军事绝对对听党的指挥”，“代表党的毛泽东即为红军中心之所在”。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中，范长江写道红军战士“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农村青年”，军队的着装“棉的、夹的、单的、军衣、便衣，应有尽有”，营连长以下干部选举的基本要求有“忠实”“耐苦”“不打架”“不骂人”等等。这些平实客观的文字，还原了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的真实样貌，传播着红军与长征的真实形象。

让国内外持续关注并深入了解红军

范长江采写的红军长征系列通

讯，戳破了国民党当局的虚假宣传谎言，向国内外读者真实呈现红军长征实况，展现了红军长征的丰富场景，构建了红军长征的最初历史叙事。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华社天津前线总分社开会时，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与宣传部部长肖向荣高度评价这些报道：“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围剿’的艰难情况下，把红军的动向主张有时曲折地有时直白地告诉人民，太难了。”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也评价道：“长江在1935年写的其他旅行通讯，其流传之广，作用之大令人吃惊。”

范长江撰写的系列通讯在《大公报》上陆续发表后，“红半了天，受到全国人士的注意”。文章被《国闻周报》、《大公报》上海版等转载，凭借着报刊庞大的发行网络，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被更多的人“看见”。不仅如此，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也转载了部分报道。1935年12月9日《救国时报》创刊号上刊登的《红军在西北开展》的文章中，即转引《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中“既不占地，又不攻城，只绕了几个圈子”来概括红军在西北的机动作战。这些文章在巴黎的发表，与1936年3月开始在巴黎《全民月刊》连载的陈云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形成了“联动效应”，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红军长征的持续关注。

而长征系列报道对范长江个人而言同样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他萦绕已久的困惑，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更让他在实地见闻中明晰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和未来，为他日后成长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流动即活力 交融即新生

——明清时期秦腔的跨域传播

□ 张 健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秦腔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通过铿锵明快的“欢音”与哀婉凄恻的“苦音”等彩腔调式，展现了坦荡刚烈和坚韧质朴的群体人格，是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传统地方戏曲大多与方言地域高度绑定，从而呈现固定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在明末至清乾隆前期，秦腔却突破了西北地域限制，凭借高亢慷慨的艺术特质与通俗亲民的表达形式，形成跨域传播态势，成为中华戏曲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典型范本。

秦腔从西北走向江南。明清秦腔文化历经兴盛与消歇的起伏，逐步完成了由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向江南等区域不断扩散的演变过程。

明末崇祯年间，在西北起兵的李自成部队将同州梆子（东路秦腔）作为军戏随军扩散，民间有“唱红了南京和燕山”的俗谚，反映当时秦腔渡江南的境况。清乾隆三十九年至嘉庆七年，擅长刻画世俗人情、演绎忠孝故事的秦腔名伶魏长生曾三度北上京师，其间更于乾隆五十二年南下扬州，经由多地巡演的持续传播，最终形成秦腔文化热潮，构建了跨地域文化流行区。魏长生的演艺活动拓展了清乾隆年间秦腔分布格局，推动秦腔文化走向鼎盛时段，促使本地戏班主动吸纳秦腔唱腔、效仿秦腔剧目，引发江南名伶纷纷研习秦腔表演技艺，形成“转相效法，染及乡隅”的发展态势。

诸多文人诗词记载了当时秦腔流行盛况，如费轩《扬州梦香词》、魏荔彤《江南竹枝词》等诗文，生动描绘出扬州民众聆听秦腔、追捧梆子声腔的社会风尚，其中“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更是直观展现

了秦腔雄浑唱腔与江南地域风情碰撞交融的独特文化景观。秦腔影响力辐射南京、苏杭等江南文化核心区域，受众覆盖士绅商贾、市井百姓各阶层。

清代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盛极一时的秦腔热潮逐步降温、走向消歇，但并未彻底消亡，而是与江南本土戏曲深度融合迭代，为本土剧种注入了唱腔、剧目和表演技法等新鲜血液，实现了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吸纳与借鉴创新。

商贸往来与人口迁徙成就秦腔跨域传播。明清秦腔突破地域壁垒异地发展，这并非偶然的现象，而是依托陕陕商贾跨域商贸往来、移民群体的逐步形成。这一跨地域文化现象超越单纯的艺术审美范畴，既是地域文化持续互动的表征，也是流动群体文化认同不断重构的重要载体。

明清陕西与淮扬地区频繁的跨区域商贸往来，为秦腔南下提供了关键通道与经济保障。明代“食盐开中”政策推行后，政府允许商人向边地缴纳粮食换取盐引贩卖食盐，于是陕西商贾以“边商”身份往返西北与淮扬之间，垄断淮盐贸易核心资源。“开中折色”改革后，政府要求商人以向朝廷缴纳白银取代向边地缴纳粮食，进而换取盐引贩卖食盐。此后，大量陕陕商贾脱离边地、流寓扬州，转型为内陆盐商，长期扎根淮扬经营发展。除盐业外，山陕商贾还主导皮货、布匹和丝绸等跨域贸易，由此形成双向流通的商贸格局。可见商贸交流构建了西北至江南的文化传播大通道，流寓江南的山陕商贾群体，成为秦腔的核心受众与经济支持者，也为秦腔班社南下和异地发展提供了经济

基础。

人口迁徙与移民文化圈层的形成，是秦腔在异地生根的文化基础。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大量山陕商贾举家流寓江南，促使西北移民群体聚集。在明代扬州流寓籍士绅商贾中，陕西籍科举文人、商户民众占比高，仅进士与举人群体中陕西籍占比已达五分之一，大量流寓商贾及其群体社交活动，通过方言、习俗、观念与审美价值等因素，深刻影响了当地地域文化语境与风貌。与此同时，流寓商贾的乡土情怀与文化认同，让秦腔成为其寄托乡愁、维系地缘联结的精神载体，为秦腔在江南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文化氛围。

山陕会馆作为明清地缘商贸与文化交流的核心载体，其核心功能是“联乡情、敦信义”，维系异地移民的地缘联结与文化认同，而戏曲展演是其核心文化活动，明清各地山陕会馆均配套修建戏台、戏楼，定期的秦腔演出，成为秦腔文化扩散的时空节点。扬州山陕会馆是江南最早设置的商业会馆之一，其规模宏大、影响力深远，不仅是商贸洽谈、同业聚合的场所，更是秦腔文化异地扩散的源头。依托会馆戏台，秦腔班社的常态化展演活动，让秦腔逐步走出移民圈层，被本地民众接受甚至喜爱。同时，江南盐商普遍蓄养戏班、置办乐部，雄厚的资本支撑让秦腔演出得以稳定发展，从而促使秦腔文化异地传播。

秦腔跨域传播助推南北文化认同。明清秦腔跨域传播的历史实践，在南北文化交融、地域身份建构、家国情怀培育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

发展、地域性文化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秦腔承载民间历史记忆，其剧目内容多取材历史故事和民间忠义传说，借助普通民众可以感知与共情的叙事方式，通过质朴直白的唱腔，将忠孝爱国、守望相助、崇德守礼的价值理念扎根市井民间，成为基层社会道德教化、家国情怀培植的重要载体。明清以来秦腔的西进东扩、北上南下，打破了地域文化壁垒，促使粗犷质朴与温婉雅致的不同戏曲文化特性融合共生。流寓江南的山陕商贾通过秦腔维系乡土记忆、凝聚地缘共识，异地构建文化归属感；而江南本土民众则突破地域认知局限，通过秦腔认知西北地域文化特色。秦腔跨域传播以及产生的文化交融，在弱化地域文化隔阂的同时，强化了不同地域民众对中华戏曲文化的整体认同，也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特质。

明清秦腔跨域传播是商贸往来、人口流动、文化融合的结果。这既印证了传统戏曲“流动即活力、交融即新生”的历史规律，也清晰地展现了地域文化由本土坚守到跨域传播，再由碰撞交流至融合共生的演变过程。历经跨域传播、异质文化碰撞，可不断丰富文化内涵，促使文化创新。秦腔与江南戏曲的融合，既保留了自身的精神内核，又吸纳了江南审美特质，从而使戏曲艺术升级迭代。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土地被瓜分，经济崩溃，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到1938年40%的水平。1949年联邦德国正式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进入复兴和繁荣期，1970年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推动战后德国现代化的首要动力。促进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众多，其中将企业实践培训与职业学校理论教育有机结合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被称为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对德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双元制”的起源与定型。德国“双元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行会学徒培训。20世纪初，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德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业国，更多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进修学校如工艺学校、商业学校建立起来。自1937年开始，德国中央层面通过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推动企业培训与职业学校紧密结合。1938年规定职业学校为义务教育，1940年统一职业学校的教学时间，推动职业学校教育规范化发展，提升职业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这一时期，“双元制”概念虽然还未出现，但在企业培训和在职业学校学习文化知识的“双元”模式已经在德国手工业、工商业等行业培训中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深入人心。

二战后联邦德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复苏需要更多高素质技工人才，联邦德国政府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培训。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十二条规定，所有德国人均有自由选择其职业、工作地点及训练地点的权利。1964年，联邦德国教育委员会在《对历史和现今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学校教育的鉴定》中首次将存在了100多年的企业与职业学校的“双元”职业教育形式以“双元制”一词表述出来。1969年，联邦德国颁布《联邦德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培训雇主和受培训人的报酬义务、培训职业认可、培训关系登记、考试、控制和监督、罚金规定等内容，以法制形式统一规范“双元制”发展，以使其更好地适应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求。此后，“双元制”进入迭代升级的新发展阶段，也成为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核心和青年人就业的主要路径。

何为“双元制”。“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指青少年根据自己的意愿、能力选择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在企业接受职业技能训练、在职业学校接受专业理论以及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形式，旨在培养促进德国经济、产业发展以及现代化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中等教育第二阶段的教育形式，相当于我国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接收完成中等教育第一阶段普通教育毕业生（相当于我国初中毕业生），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主体。“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遵守“职业性”原则，把学徒在企业或工厂的技能培训和实践操作训练与职业生产全过程紧密联系，在企业生产现场学习分析和解决职业实践问题、职业行为规范、质量意识、劳动态度、劳动纪律等，目标是提高学徒与职业相关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在职业学校主要通过课堂进行系统的理论授课，学生学习与职业相关的理论知识。

“双元制”中的“一元”是企业，另外“一元”是职业学校，以企业为核心、以企业培训为主。企业负责招收学徒，与学徒签订培训合同，制定企业培训计划，开展企业培训。在“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周期中，学徒在企业或工厂的培训中心进行技能培训和实践操作的时间约占70%—80%，在职业学校的学习时间约占20%—30%，“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也以企业为主，企业承担学徒在企业的培训经费，并为培训学徒提供生活津贴，企业投入的培训经费约占总经费的2/3，国家承担约1/3。

“双元制”职业教育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最为典型的特征是拥有独立且相关的两套教育培训和管理系统，所有进入该系统的青年同时具有企业学徒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双重身份。企业与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青年人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职业教育合同，明确在培训期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企业严格按照合同开展高质量学徒培训提供法律约束。企业学徒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双重身份也激发学徒（学生）身份感，积极提升职业本领。

“双元制”推动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增长。“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支撑德国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柱，它从人才培养、现代工业与外贸发展、德国产品国际影响力提升等方面，大力推动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增长。

为经济繁荣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撑。“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培养高水平技术工人的重要途径。德国前

推动战后联邦德国经济腾飞『双元制』职业教育

总理科尔曾评价道：“经过良好职业培训的青年，是我国的最大资本，是经济稳定的保障。”战后随着人口的自然增加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大批移民，联邦德国劳动力不断增加，就业人口从1950年的2038万人增长到1965年的2670万人，新增劳动力需要经过培训才能上岗。在1975年至1992年期间，企业培训学徒数从1975年的133万增长到1985年的183万，“双元制”职业教育规模达到顶峰。据统计，1960年全国接受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青年人已占同龄青年（16—18岁）的56.6%，1965年又上升至57.7%。这为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推动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与外贸增长。“双元制”职业教育与联邦德国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高度契合。二战后联邦德国工业和对外贸易取得了极大的发展。1951—1980年联邦德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7%，超过美国、法国、英国。1962年联邦德国跃居世界第二大贸易国。1950—1970年联邦德国工业营业额增长6倍，到1972年汽车制造业、电气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这四个工业部门的营业额占工业营业额的38.3%。与之相应，在1977—1992年期间，工业和贸易行业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数最多的领域，其次是手工业、自由职业、公共事业和农业。到1992年，在工业和贸易行业的学徒数占总数的比例为52%，在手工业行业为33.7%，其他行业依次为自由职业占7.2%，公共事业占4.0%，农业占2.2%。“双元制”职业教育致力于精准对接、精准服务联邦德国工业进步需求与对外贸易发展需求，为德国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及建设贸易大国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提高了“德国制造”全球竞争力。19世纪，“德国制造”一度成为廉价质劣的代名词。二战后，联邦德国发展社会市场经济，依托高质量“双元制”职业教育改进生产工艺，重塑制造业质量体系。在大力推行“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后，联邦德国就业人口持续增加，失业率从1950年的8.2%降至1970年的0.5%，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的大批熟练产业工人，增加了德国的产业竞争力，使德国在欧洲国家中的竞争力增强。“德国制造”也从原来的劣质标签，变成高标准、高质量的产品标志。二战后，联邦德国在产品上特意印刷Made in W.Germany（西德制造）字样，由于联邦德国在制造业的高标准、严要求、精流程，“德国标准”被欧盟、世贸组织等多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组织采用。“德国制造”成了全球高质量制造的代名词，“双元制”职业教育促进了德国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与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

